

有教无类

——《论语》读书札记

卢芳玉

孔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圣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；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”

孔子一生对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，尤其是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。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，大概从“三十而立”之年开始收徒讲学，直至七十三岁去世，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生活，即使在鲁国从政期间以及访问列国诸侯，到处碰壁，终不得志时，他都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，发展自己创设的私学，始终没有停止过教学工作，始终“诲人不倦”地把希望寄托在未来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，孔子“以诗、书、礼、乐教弟子，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。“三千”应是泛指孔子一生中教授学生的总数，其中“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，也只是一种约数。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说：孔子曰：“受业身通者七十又七人。”）据匡亚明先生的《孔子评传》可知，有姓名可考的孔门弟子凡九十五人。尤其是他首创平民教育，开办了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私学。他的教育思想、教学方法、治学态度以及所倡导的互敬互爱的师生关系，在今天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孔子教育思想中最具先进性与时代性的当是“有教无类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39章）。对于“有教无类”，马融注曰：“言人所在见教，无有种类。”皇侃疏曰：“人乃有贵贱，宜同资教，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；教之则善，本无类也。”（《论语义疏》）引而申之，人不分部族国家、等级贵贱、贫富老幼以及资质优劣等等，均有受教育的权利。

“有教无类”首先体现在对待弟子不分贫富贵贱。孔门弟子有贵族：象来自鲁国的孟懿子、南宫敬叔，来自宋国的司马牛等，但大多出身贫贱：颜回的生活状态是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11章）；子路则是“卞之野人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；仲弓则是“贱人”之子；闵子骞冬天没有御寒的衣服，把芦花当作棉絮用；曾参是卫国人，他的母亲靠织布为生，他本人往往三天不煮饭，十年不添置新衣服；原宪住的房子“蓬户不全”、“上漏下湿”。孔子并不因为他们的贫困而稍加轻视，而是更看重他们的学问品行，《论语》中记录了他多次称许颜回的话，他也曾热情赞美贱人之子仲弓说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6章）孔子收受门徒是不讲什么条件的，他说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7章）只要交上一束肉干作学费，象征性的表示对老师的敬意，孔子就给以学习的机会。圣人的门槛是何其低也！杨伯峻先生以为这就是“有教无类”。

其次，孔门弟子不分国家和地域。限于鲁国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交通条件，当然以鲁、卫、齐、宋等国最多，但也有非华夏国的吴、楚、秦等国的学生，如言偃是吴国人，秦商、公孙龙、任不齐是楚国人，秦祖、壤驷赤是秦国人。当时的吴楚被称为“蛮夷”之邦，秦则属“戎狄”之国，但是孔子并不因为“非我族类”而把他们拒之门外。

最后，孔门弟子不分职业尊卑。如子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子张是农民，颜涿聚甚至是梁父的一个“大盗”。难怪当时齐国的大夫南郭惠子非常奇怪的发问：“夫子之门，何其杂也？”南郭惠子的疑问正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观点。子贡回答他说：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，而且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，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。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。（《荀子·法行》）这一段记录正好说明了孔子“有教无类”

的教育思想。

孔子“有教无类”这一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历史原因。

“有教无类”的思想是春秋时期尚贤思想的产物。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潮，一是西周以来旧有的牢固的宗法传统，如忠君尊王思想；一是春秋以来的变化着的新观念，如尚贤思想等等。两种思想倾向同时并存、交织混杂，以至在孔子思想中处处流露着新与旧、保守与革新的矛盾冲突。春秋时期，新兴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阶段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必须打破传统的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，因此，新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尚贤用能的主张，符合新兴贵族阶层的需要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。但是孔子“有教无类”教育思想是否真的如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具有“人民性”和“民主性”呢？孔子一生力图恢复周礼，他理想的大同社会是尧舜时代，小康社会是文武周公时代。“尊王忠君”是他政治思想的总纲，他所提倡的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正是为了维护正统的君主地位。虽然他的主张中不乏具有远远超出时代限制的先进思想，但他培养人才的目的不过是更好的实现他理想中的政治秩序。作为具有渊博知识和深广见闻的孔子，其政治思想并不具备改革意味，甚至显得有些保守，但他却能敏感的把握到时代的脉搏，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；再者，孔子儿时的贫困经历也让他看到了蕴藏在“小人”中的智慧，当然也意识到了教育民众的重要性。

同时，有教无类也是和孔子的“仁”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的。“仁”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，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，也是孔子从事教育的核心所在。他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弟子们：“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6章）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6章）甚至提出“当仁，不让于师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36章）的主张。据统计，《论语》中共出现“仁”字109次，是《论语》中出现最多的一个概念。孔子及后世儒家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亦是“仁”。什么是“仁”？其实质是什么？孔子回答颜渊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1章）回答司马牛说：“仁者，其言也切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3章）回答樊迟说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19章）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22章）回答仲弓说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2章）回答子张说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”，即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6章）

尽管孔子对弟子们的回答不尽相同，但“仁者爱人”是一个总的原则。他说：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30章）“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1章）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2章）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2章）君子不但要爱人，还要泛爱众生，要教育众生，引导他们向善。《论语·子路》9章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子适卫，冉有仆，子曰：‘庶矣哉！’冉有曰：‘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富之。’曰：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教之。’”可见孔子希望通过“庶、富、教”的途径，以实现小康、大同的政治梦想。还有一段记录更能体现孔子的想法：“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‘割鸡焉用牛刀？’子游对曰：‘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子曰：‘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！前言戏之耳。’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4章）教育民众的目的是使民“易使”，可见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思想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。孔子深感世风日下，力图先恢复他理想中的西周初年的文武之治，然后达到儒家的最高理想——大同社会，但是自己的仁政德治理想一时难以实现，孔子只好寄希望于自己的学生。正是基于此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屡不见用后，慨然叹曰：“归哉！归哉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回鲁国专心教书育人去了。

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表明：他对教育的巨大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。他曾说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2章）所谓“性”是指人的共同本性；所谓“习”是指后天的环境、教育的习染。孔子认为人的先天素质都差不多，只是后天的学习不同而相差愈远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接受良好的影响，在道德、知识上得到改造和提高，即使是有不良习惯的人也能变好。这里就有着可贵的唯物主义的因素，是孔子对先秦哲学的巨大贡献，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基础。到了战国时代，孟子的性善论发展了孔子的学说，更加肯定了教育的功能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尊师重教、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。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正是“有教无类”的深广影响，古代封建帝王历来重视教化，注重从下层百姓中选拔人才。这种政策使无数的下层读书人“十年辛酸无人晓，一朝成名天下知”。在封建家族观念十分强烈的时代，更使他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 and 家族的命运，可以实现光宗耀祖的梦想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这对下层士子是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的。同时也有效的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一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。

“有教无类”，实际上是一种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和实践，在当时对于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，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“有教无类”不但继承、发展和传播了古代文化，而且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，适应了“士”阶层兴起和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，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，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。把学校由官府扩大到民间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。对于今天的中国教育，也具有极为现实的启示价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天我们也一直在提倡普及教育，政府也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在广大贫困地区里，在大量的城市贫民中，仍然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，昂贵的学费已经成为许多家长的沉重负担。那些打着各种教育的名义而索要的额外费用，更使家长苦不堪言！可以这样说，“有教无类”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做到。“有教无类”不仅关系到每位家长和学生的切身利益，而且直接关系民族发展、国家前途与当今和谐社会的发展。这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们严肃思考的问题。